



■图为缪萍(中)在原种禽场工作时场景

缪萍：在改革中勇于实践，靠勤耕不辍致富

□记者 陈宗建

16岁离校步入社会，从实践中将自己锻炼成一名职业小能手

缪萍告诉记者，她从小酷爱读书。但当她念完初中升高中时，她的母亲为她指了两条出路：一是升学就读，继续深造；二是弃学就业，去学一门技术。缪萍当时斟酌再三，最终选择了工作，并去了上海禽蛋公司金桥鸡场报到，当了一名学徒工。那是1979年，缪萍时年16岁。缪萍说，她的父母因身子骨弱，故在当时那个靠劳力挣工分的年月，全家劳力明显不敌他人，收入也是全村最少的，所以她当时不想因供她升学而让本已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为她再去背负难以承受之重。

在金桥鸡场，缪萍属年纪最小。当时，她被分配在金桥鸡场育种车间从事育种孵化工作。她的父母为此曾告诫她，较之于饲养蛋鸡，育种车间的东西更多，故特嘱咐她要好好干。缪萍对此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废寝忘食地埋头苦干，并很快熟悉了整个生产工艺流程。从出壳的雏鸡到成鸡，选种，整个过程缪萍均了然于心，干得得心应手。缪萍说，她在读小学三年级时，便已能独自一人替父母在家挑起养猪等家务活，所以进了工作单位后，也特别能吃苦耐劳，并很快赢得了单位师傅们对她的刮目相看。

在金桥鸡场呆了两年后，缪萍便离开了金桥鸡场，去了川沙县农场工作。直到1985年，缪萍上了中专，成为一名定向培养的业务骨干。1987年，缪萍中专毕业后又去了王港牧场，开始饲养肉鸡。至此，缪萍通过一路摸爬滚打，已深谙种鸡、蛋鸡及肉鸡的饲养门道，为自己积累了较丰富的饲养实践经验。

试水个体家禽养殖，第一年单干即跨入万元门槛成为示范户

缪萍回忆，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港乡的农副业发展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当时，不少村民已纷纷

在自家划出空间，以20平方米或30平方米为单元，搞起了家庭养殖，并得到了她父母的保驾护航。”缪萍说，她的父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沪上第一代畜牧兽医中专生，堪称行业元老。而令缪萍尤为感到骄傲的是，她的母亲亲曾获得过市、县级多项表彰荣誉，并还曾多次被请到市科学会堂(当年沪上最著名的科技交流活动专业场所)开展业务讲座，解放日报等一些媒体为此还曾专门采访过她的母亲。因此，当年王港乡家庭养殖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她父母背后的支撑。而缪萍本人，则也是在她父母的潜移默化下逐步走上了一条职业化家庭养殖发展之路，使她在自主创业的路上逐步经历了淬炼，收获了成功。

1985年—1987年，缪萍在父母的鼓励下，开始独立上手试水家庭养殖，且第一年收入便破了万元，成为当地养鸡户中率先跻身“万元门户”的一名致富带头人，不仅令她倍受鼓舞，同时也让身边的邻里羡慕不已。缪萍说，在改革初期，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完成菜篮子工程“丰收计划”任务，以推动养殖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快速生长优势的进口AA肉鸡成为当时的主推品种。因此，她当时也饲养了300只AA肉鸡，以满足市场需求，并让她在涉足个体饲养的初始，得以收获了颇丰的第一桶金。1989年，缪萍又建起了鸡棚，将养殖规模扩容至一千多羽，在自己的出生地王港乡渐渐有了名气。此时，王港乡的养鸡户在她的示范引领下，也逐渐形成规模。

从散养到规模养殖，卧薪尝胆将蛋种鸡产业一步步做大做强

有分析认为，我国家禽养殖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传统散养阶段；至90年代中期，由散养向适度规模化、商品化饲养过渡阶段；再后来就是适度规模向规模化饲养过渡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而缪萍的种禽发展轨迹，也基本对应了这一时间节点。从1985年至1990年，缪萍的

在国家鼓励农民以各种方式进入流通领域改革初期，她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遇，通过家庭养殖，成为当地率先跨入万元户门槛的一名养鸡能手；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她又携丈夫一起，曾打造了浦东养殖业最大的一条种鸡蛋全产业链——

饲养模式尚处于传统散养阶段，由于养殖方式得当，其发展势头一路向好。“当时，鸡刚养下，许多采购商便会慕名而来，将订金早早交付于她手中，所以根本不愁销。”1991年，缪萍又鼓励丈夫辗转去了浦东高南牧场进行承包。当时，该承包场内已有1千多羽AA种鸡，同时兼供种蛋。而在缪萍的家里，此时还有一千多羽肉圈养的鸡，家里家外已形成了一条产业链，初具规模。

1994年，高南牧场由于外高桥市政规划被拆迁。于是，缪萍又同丈夫去孙桥承包了一家因亏损急于转包的牧场，并开始正式进入脱产养鸡。那是一个拥有1.5万羽蛋鸡饲养量的规模场，且养的全是进口的罗曼高产蛋鸡。由于当时市场行情好，加之鸡蛋全由上海禽蛋公司统一收购，所以接手之后一路高歌猛进，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收入可观。到了1995年，鸡场因意外遭遇了一场阴性鸡瘟，使缪萍连续数月亏损了几十万元，蒙受巨大损失。“但好在当时的全年财务收支平衡并未大亏，算是有惊无险。”

然而，自1997年孙桥牧场承包期满后，缪萍夫妇的养殖业便开始遭遇瓶颈，其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当时，供大于求所导致的市场疲软迹象已开始逐渐影响到产业发展。尤其是，此时的缪萍与丈夫不仅已

从她父亲手上接过了在黄楼乡的旗杆种鸡场(后改为棋杆种禽场)，将养鸡规模扩至近4万羽，其中既有蛋种鸡，又有肉种鸡，并对原有设备进行了更新改造，为扩容投下了大笔资金。同时，已将业务拓展至全国多个省市，使其在应收款回笼及物流损耗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致使最终产值大幅缩水。而令缪萍夫妇感到尤为棘手的是，当时我国蛋鸡行业曾因接连遭受2001年区域性重大疾病、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2004年在全国十几个省区散发并持续的禽流感等重大疾病的冲击打压和市场需求的反复拉动之影响，致使缪萍养殖场内的蛋鸡存栏数在短时间内也跟着急剧起伏震荡，从而让缪萍夫妇从1997年至2003年一直徘徊于痛苦的挣扎之中，让她与丈夫在重创中整整苦熬了6年时间。

自2004年禽流感风波之后，市场行情开始迅速回暖，雏鸡的市场价已从最高二三角/只上升至3.2元/只，交易价格强劲反弹。然而，由于禽流感时，缪萍夫妇已根据当时的形势评估减少了生产量，加之调整种禽饲养生产周期最短也要9个月以上，故导致一时拿不出足够应市产品。好在2002年时，缪萍夫妇已在川沙新镇新浜村包了50亩地，为自己留了“后手”。其中，有近五千平方米是由羊棚改造而成，并签了20年合同的鸡舍，其养殖规模已达5万羽，且清一色蛋种鸡。为此，缪萍已能对蛋种鸡与肉种鸡实施分开养殖，在提升标准化养殖管理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市场补缺应急能力。

2006年，缪萍夫妇又建起了两

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开始，并曾经历了三个历史进程：新时期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初创阶段；随着农村改革逐步深化，开始向流通、价格及城市改革领域扩展阶段；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创立阶段。1978年后，上海郊区根据中央关于“绝不放松粮食生产，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积极发展了以鲜活副食品为主的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生产。进而又曾鼓励农民以各种方式进入流通领域，以调动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促进农村市场发育，从而使一批能工巧匠、经营能手有了用武之地，使专业户及户与户之间自愿结合的新经济联合体不断涌现，生产经营呈现了区域性、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个大型孵房车间，一个用以孵蛋鸡，一个用以孵肉鸡，其设备年孵化种蛋与蛋鸡能力分别可达600多万枚和1200余万羽，使孵化能力位列全市业内民营企业之首。不仅如此，缪萍夫妇的种禽场此时除了已能为市场提供蛋种鸡与肉种鸡外，还能为生物药厂生产疫苗提供胚胎的蛋。即从孵房到种鸡出栏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全产业链，这在当时全市民营行业内也可谓首屈一指。2009年，在经过了新一轮标准化改造之后，缪萍夫妇种禽场的养殖规模已突破了15万羽，其中蛋种鸡占了70%左右，使蛋种鸡养殖规模跃居沪郊民营企业之首，在孵房、养殖品种与规模上彰显出龙头地位优势。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用毕生追求诠释了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

根据上海郊区生态建设规划与布局调整，缪萍的种禽场现已配合完成退养。缪萍坦言，这份基业可谓倾注了她与丈夫的毕生心血。夫妻俩一路走来勤耕不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现在身上所落下的多种免疫系统慢病，便是长期饲养操劳与压力积压所致”。然而，缪萍却也因此而为自己能靠勤劳双手收获劳动果实、从脚踏实地的打拼中走过青春而感到无悔于人生，并将这段人生视同为自己生命中可传衍的一种精神财富。而她的这段经历，也将成为浦东农业发展史上记录一代农民勤劳致富、励精图治的又一段改革创业佳话，并能被转化为一股动力，激励后人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征程中砥砺前行。

